

28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

陈原
创世的人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陇原创世的人们

葛士英

一九九〇年七月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兰州

责任编辑 肖淑瑛 陈泽奎
封面设计 朱光荣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5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6-00859-9/K.118 定价: 4.00元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贡唐仓·丹贝旺旭（兼）

副主任：邓成城 王 殿 贾维坤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廷秀（回族） 马 通（回族）

水天长（女） 王宜之 权少文

张思温 周丕显 郅楚才

高旭华 高宪岗 韩志德

甄载明

代 序

朱宣人

我是1948年9月从英国回来的。在宜兴省亲一周后便来到兰州，担任国立兰州兽医学院病理学教授，加入了建设西北畜牧兽医事业的战斗行列。在漫长的40年中，经历了两个时期，亲身体会到甘肃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同广大科学工作者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为了使全社会都能了解他们中一些代表人物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采取由本人回忆自叙和专人采访报道结合的方式，将文章陆续辑成专集出版，取名《陇原创业的人们》。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第一集的主人公们，有些是解放初期响应新中国关于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从国外或省外来的老一辈，更多的是红旗下成长听从祖国召唤来的新一代。他们中有些是毕生从事高等教育的，在创立新的学科和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在研究和开发方面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更多的是站在生产、研究、开发第一线的，在石油化学、真空技术、地质勘探、水利建设、治沙造林、畜牧园艺、动植物保护、医药卫生、电子计算机应用开发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他们同各自的合作者，在建设陇原的交响乐曲中，共同谱写了新的乐章！

我有幸先读到第一集的原稿，深受教益。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作过自白：“我要做的是以我微薄的绵力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这本集子的主人公们，就是这样一些典范，在立志、工作、成功的道路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愿意和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以他们为榜样共勉之。

一九九一年元月



目 录

回忆录片断.....	郑国锴 (1)
西北植物生理学的创建及其发展.....	吕忠恕 (16)
我是怎样从巴黎到兰州来的.....	李秉德 (24)
欲变桑梓貌 奋力几回搏	
——参加甘肃省畜牧科教工作39载的回忆	
.....	杨诗兴 彭大惠 (30)
为了明天	
——甘肃植保事业发展的回忆.....	卫润屋 (46)
我的追求.....	吴仁润 (57)
我的事业与大西北紧紧相连.....	陈文源 (65)
一条永远不平坦的路.....	彭 兴 (70)
扎根大西北.....	秦保燕 (77)
终生甘作铺路石.....	成广仁 (86)
在数学王国里不断追求.....	张忠辅 (96)
他的爱全部献给了事业	
——记西北地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涤	刘智忠 (102)
归国三十七年.....	王清海 (110)
绿色的召唤	
——从事林业工作的几段回忆.....	王见曾 (117)
为振兴合成橡胶工业倾注心血.....	刘大华 (12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阮圣冬 (133)

魂牵梦绕为新绿

——来甘肃工作的三十三年 乔魁利(140)

奉献, 没有止境 汤秉衡口述 付林执笔(148)

改造“黄龙”之战

——河西走廊治沙造林科技纪实 郭 普(159)

第一代兰炼人

——回忆徐今强同志 贾庆礼(172)

责任所在 拚命为之

——一个普通科技人员的工作片断 刘国杰(197)

我的事业在大西北 赵荣材(205)

陇原大地留足迹

——从事水利建设的记述 谭绍材(217)

为航天事业奋斗的三十年 达道安(224)

毕生奉献大西北 张 涛(230)

献身甘肃水文事业 陈满祥(237)

后 记 编 者(247)

回忆录片断

郑国锷

毅然返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新闻发布后，八年抗日战争就宣告结束了。当时我在陪都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生物系当研究生，听到广播后，真是欢喜若狂。日本帝国主义终于被打倒了，我们获得了最后

胜利。

1946年5月，我们是中大首批复员回南京的。几个月以后，我又开始教学工作，并继续完成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从当时的条件来说，仪器和药品都很缺乏，要克服许多困难。例如实验要用无水酒精，走遍了南京商店集中的太平路也没买到一瓶。又如显微镜照相机也没有，只好借人家一般摄影用的机子，对着显微镜上照。效果当然不好。就这样，在重重阻碍的情况下，1947年5月，终于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进行了答辩。毕业后不久，由于几位老师的推荐，获得了美国田纳西大学800美元一年的奖学金，于1948年初到田纳西大学动物昆虫系学习。由于奖学金每个月平均不到67美元，只能住在学校每月15元租金的临时宿舍里，这是由战时美军军用的活动房子改装的。初到时应正是一月最冷的

天气，虽然房子装有暖气，但暖气来时热得只能穿件汗背心，到半夜暖气停了，只有一条毛毯又冷得要命。

田纳西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州，那时候的种族隔离很厉害，公共汽车、电影院、饭店、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是“黑白分明”，黑人不能到白人区。如公共汽车，白人在前面的一节车厢，黑人在后面，我们黄脸皮的虽然不当黑人对待，但无形的压力很大。明明看到有住房招租的广告，但我们去租时，就问：“是日本人吗？”回答说是中国人就吃闭门羹，推说没有房子。那时候，中国是战胜国，在美国可远不如战败的日本，好像中国人低人一等似的，为此心情很不痛快。

当时田纳西大学动物昆虫系还不能授予博士学位，我在那里读了两个学期（一年四个学期），又获得了北方威斯康星大学植物系的奖学金，于同年7月就转学到该校的细胞研究室。

细胞研究室的主任是原籍英国的C.L.Huskins（赫斯金）教授。这一年他刚好用药物处理洋葱根尖发现了体细胞减数的问题，非常高兴，可是他们做了大量显微镜切片，没有人观察、整理和分析。我去之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是7月中旬去的，去后不久，我的导师C.L.Huskins教授，就交给我大量片子，希望我能在圣诞节前完成。同时又利用暑假，请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教授、细胞学家许元龙（美籍华人），来审核他的新发现，许教授也请我帮他做片子。因在假期中，还没上课，我就日以继夜地干起来，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了一个学期的工作。当我把整理好的材料，统计数据和照片等交给Huskins教授时，他非常惊奇。怕我草率从事，他仔细检查了我交给他的资料，又把照片放在显微镜下亲自核对，一切都无差错后，才说了一个字“Wonderful”（非常好的）。自此以后，他对我另眼看待了，非常关心我的生活，还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当他得知我的妻子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生物系毕业的情况后，为了使我安心工

作和学习，就主动提出也给我妻子全元栩一份奖学金，并替她办理了入境和入学手续，让她也到美国攻读学位。于是我的妻子于1949年1月到达威斯康星大学，和我在同一研究室学习和工作。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真是兴高采烈，顿时感到脸上有光采了。最明显的是同学去租住房时，不再是拒之门外，而是笑脸相迎了。当美国纽约时报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后，好多同学都把新中国的国旗指给我们看，并竖起大拇指说“好！”

1950年，新中国派伍修权同志到联合国作证，并发表义正词严的演说，纽约时报全文刊登，并附有照片，说伍修权同志的照片，形态像是被压的弹簧，当时轰动了全美和整个世界。

自此以后，我们在国外的华侨和留学生有了新中国作靠山，顿时身价倍增，腰板子挺得直直的，不再有过去国民党时期的那种压迫感了。可是好景不长，美国人民虽然对我们友好，热情，但美国政府蒋介石逃往台湾后，杜鲁门就调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而且在1950年6月，悍然发动朝鲜战争，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他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我们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同学和一部分进步的美国同学，与鼓吹侵略战争的反动教授，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后驳得他们无词以对，中国留学生大获全胜。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学坚决要求回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1950年回国后，在美国的华侨日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的文章，介绍了他回国后看到的新中国的情况，希望大家学成早日回国为新中国服务。同时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留美同学的进步组织），也油印了一些归国同学的来信，介绍新中国的新情况和新气象，如成渝铁路通车的消息，对

我们抗战初在重庆的人感触最深，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又有一些同学回国了。像曾任甘肃省侨联主席的李学禧同志，就是放弃了在联合国任秘书的职务，与仍在威斯康星大学药学系学习的未婚妻告别后，于1950年8月回国的。这一个时期，我的妻子已获得了硕士学位，虽然我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但我们的心已经飞向祖国，我俩预定了船票，一待我的论文答辩通过，就一起回国。

提到回国，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我们决定回国后，不少同学来和我们谈心，说新中国刚成立，百事待举，我们都是旧中国出来的，回去后生活一定没有这里舒服，并说你们都已得了学位，清苦生活即将结束了，从此可以过优裕的生活了，回去后也没有这么好的工作条件，为什么要匆匆回去呢？我们想想，觉得这些话也有道理。回想在异国留学几年的生活，的确很艰苦，没有享什么福，眼前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工作待遇都会慢慢好起来，再呆几年也未尝不可。但又转念细想，我们为什么要出国？是为了镀金吗？不！是想多学点本领，为祖国多做点工作。现在的祖国已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而是百废待举，这不正是我们回去贡献力量的时候吗？“迟回不如早归！”最后还是决定回国。决定回国后，还得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批准，否则也是回不来的。当时是1950年上半年，每个月都有一批同学回国，而“总统轮船公司”开往香港的轮船，每个月只有一班，交通十分不便。实际上，美国是不希望中国留学生回新中国服务的，可当时假面具还戴着。后来看到情况不对，到我们申请时，侵朝战争已经开始，美国国务院就作出了种种限制，规定只有两广（广东、广西）的留学生才能回去，申请书上一定要填上两广的住址、通讯处等等，而且在香港不能上岸。他们以为这样就可限制我们回国了。

还有一些人遇到的情况更糟。例如1950年底，搭我们前一班

轮船回国的钱学森教授，行李已运到码头，却忽然不准上船，还被扣押受询问。钱教授后以一万美元保释出来，美国又宣布不准他回国。几经周折，一直到1954年才回来。又如赵宗尧教授和沈善炯先生，他们乘的轮船已靠岸日本，忽然传来要他们上岸的广播。他们按照通知上岸后，却给他们戴上手铐，威逼他们到台湾去。他们坚贞不屈，据理力争，最终美方只好让他们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狠下决心是回来不了的。

由于我们早作了回国的准备，所以1950年12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毕，回国的手续也办成了。1951年1月，我们便搭乘早作准备已预定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当我们行前告知导师Huskins教授时，他非常希望我们能继续留下来工作，同时让我的妻子全元棚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再三申述我们的心情后，他非常同情我们，还说：“我不赞成美国的侵朝战争，我们英国是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祝你成功。”随后细胞研究室举行欢送会，同事同学还赠了纪念品，有派克钢笔一对，照相机一个，还有研究室全体成员及一些活动的照相册和导师的两大本著作。特别是两大本著作，几乎包含了导师一生的心血，非常珍贵（Huskins教授1953年因心脏病逝世）。要走时，我们又到导师那里告别，他还签给我们一张50美元的旅行支票。这些恩情，我们终生难忘。

1951年2月上旬，我们从旧金山乘轮船回国，于2月下旬到达香港。由于事前已请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与国内联系好，轮船停泊不久，就有一艘小轮靠上来，将我们接过去，这艘小船只能到澳门，再由广州开往澳门的专轮把我们接回广州。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设置的重重障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想叫我们回国。当他们看到这些办法还是阻止不了留学生回到新中国时，就撕掉假面具，在我们回来后的第二个月，就下令不让中国留学生回国了（申请回国的一概不批准）。

选择了兰州

我们一行36人到达广州后，有人送来了大批信件，其中也有我的。一封来自天津南开大学；一封来自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生物系；另一封是兰州大学的，都是约我们去任教。天津的信是我们早已料到的，因为和我们在威斯康星一起工作的崔激教授，早在1950年就回到南开大学生物系任教，他很早就知道我们也要回来，所以约我们去南开大学工作，这是我们离开美国之前就约好的。至于另一封信却没想到，兰州大学怎么会知道我们呢？原来是李学禧已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他也知道我们要回国，是他将我们介绍给兰大的。回国之前，我们母校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欧阳翥老师，也约我们回母校工作。所以一到广州，就知道有4所学校约我们去工作。

在广州，我们学习和参观了一周，然后兵分两路，向北到北京，向东到上海。我的家在上海附近的常熟县东张镇，所以就去了上海。3月8日，华东教育部招待我们住在百老汇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大厦）。刚住下来又送来了三封信；一是上海同济大学生物系主任郑勉教授的，他是我中学的生物老师，约我去同济大学生物系任教；另一封是吕斯百教授介绍我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教的；同时兰州大学发来了聘书，还寄来了旅费。到底去哪里好？真是天南海北任君选！虽然西北、西南都可以去，但沿海几个学校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唯有盯得最紧的兰州大学一点也不了解。其间虽有李学禧、杨浪明教授来信介绍，可他们越是说好话，越看出那边情况不怎么样。当时我们决定先回家，把儿女接出来再说。

在家住了十多天，带着女儿瑞澄回到上海。上次接待我们的同志说，天津和兰州的信都退回去了，但都给我们转达了华东教

育部部长吴有训教授的话。吴原是中大在沙坪坝时的校长，他希望我们能到兰州去，说那边很需要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兰大没见我回信，又要部长来劝说的。我们在家里谈工作地点时，父母都要我们留在上海，说离家近些；亲戚朋友也都劝我们留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当他们看到杨浪明给我的信上说：“已给你们准备好了住房，有玻璃窗和地板”，就哈哈大笑说，能把这些当作优裕条件来劝说，就说明那边的条件一定很差，还是留在这边好。这时，我们真拿不定主意，商量又商量。后经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去兰州。我们是这样想的，如果为了享受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就可以留在美国不回来，当个美籍华人。现在回来了，就是想为新中国做点有益的工作，那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从兰大不断来信和电报催问，又寄旅费等事证明，那里确实需要人，这些不正符合我们回国的目的吗？还有什么犹豫的？生活艰苦，不怕；没有条件，创造。就这样，我们决定来兰州了。

1951年4月中旬，我们一家三口乘火车离开上海（在徐州、郑州各住一晚，当时无直达车），到达西安。当时宝鸡到兰州的火车正在建设还没有通车，兰大要我们乘飞机去，所以就在宾馆等飞机票。在等候期间，巧遇一位同船回国的×先生，他是应西北大学之约来西安的，但当他看到西安的情景后，没有去报到，又匆匆地返回上海了。我们因事先早有思想准备，没有因此而发生动摇，坚持继续前进。过了一周，由西北教育部介绍买到了机票，于4月25日到达兰州。

在西安买到飞机票时，非常匆忙，来不及电告兰大，所以下了飞机没有人接。当时看到的景色与南方完全不一样，山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连草都不长；地上，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没有汽车，进城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我们雇了一辆马车，一路摇摇摆摆，晃晃悠悠，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走进萃英门内的兰大旧校址，找到了副校长陈士伟教授家里。

坐定后不久，校领导和植物系的师生都来看望我们，并忙着安排住处。我们随着去一看，果然不差，三间木质结构的老式房屋，面对静观园，室内有地板和玻璃窗（实际上不过是在纸糊窗的中央嵌了一小块玻璃）。

后来我到各家串门，才知道当时我住的房子，确实是兰大的“高级宿舍”。

第二天植物系开欢迎会，经会上介绍才道知全系只有6位教师（连两位兼职的在内），14名学生，据杨浪明教授介绍，动物系师生的情况和植物系差不多，两系学生加在一起不到30人。系上的设备少得可怜，只有一台不能切片的切片机，一个不保温的保温箱，显微镜虽有几架，但性能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切片也很少，图书只装了半个小书架，全系的图书和切片还不如我带回来的多。实验室也没几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没有丧气，“五一节”一过，就开始上课了。

当时的兰州市还不到30万人口，主要集中于现在的城关区。居民用水是从黄河里挑的，白天晚上经常停电，做饭烧的是大块煤砖。冬季取暖也用煤炭。我们来的当天，学生们就忙着帮我们买了水缸，明矾，煤油灯，煤油，暖水瓶，煤砖等，我们还纳闷，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果然，第三天晚上停电了，煤油灯发挥了作用。以后晚上的备课活动经常在煤油灯下进行。当时，市内没有像样的马路，交通工具是马车，黄河里漂流的是羊皮筏子，但只能顺水而下，逆流不行，所以后来我们到西北师院兼课时，上午乘马车到十里店，下午乘羊皮筏子在黄河铁桥边上岸回校。

这年冬天，兰州市城市建设局长任震英和兰大联系，要我们植物系和地理系师生利用寒假期间协助城建局进行城市规划的调查工作。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兰州市的远景建设规划蓝图，它非常鼓舞人心。规划规定兰州市的人口为一百万，火车站建在红山根，市区内东西各有一条很长的马路，东到东岗镇，西通西固

城。规划内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业区，黄河边规划有一条滨河路，一直通到崔家崖。这一年寒假，我们调查了东梢门外到五里铺一带的情况，盘旋路的位置和名称，就是那次我们调查后定下来的。现在兰州大学的校址当时是个公墓区，对面是一个砖瓦窑，暑假我们又调查了七里河区，一直到西固城，详细规划在哪些地方建起哪些工厂，同时，又调查了果园和菜地的情况，为将来百万人口吃菜用地作出安排。我们还在红山根一带照了许多照片，准备几十年后再看看这里的情况究竟怎样？当时想，这个规划很大，要完全实现，恐怕是很遥远的事。可是没有多久，雷坛河上新造的一座桥就显得太窄，于是在平行方向又造了一座。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还是太保守。（国务院所批准的兰州市城市规划，是后来重新修订的）。

为了加快建设步伐，从1956年起，我省从上海陆陆续续引进了大批建设人才，搬迁了几十家商店和工厂，连理发店、照像馆、糕团店、洗衣店、越剧团等全都搬迁来了，还调来大批建筑工人和工程师。1960年元旦后，省上组织了支援兰州建设上海家属慰问团，由马副省长任团长，我们一些来兰州较早的“上海人”为团员，带了一些甘肃的土特产在春节前到达上海，挨家挨户去慰问拜年。在上海一个月，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又有32家商店和工厂搬迁到兰州。这时候的兰州，已不是十年前的兰州了。面貌大为改观。

建设兰大生物系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校的植物系和动物系合并为生物系，设植物专业，当年就招收学生60名，以后连续三年都是招这个数。

合并为生物系后，当时的系主任是常麟宝教授，1953年林迪